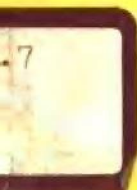


**ZHONG GUO
DANG DAI WEN XUE
SHI LUE**

李达三 主编

**中国
当代文学史略**

浙江大学出版社



中国当代文学史略

李达三 主编

责任编辑 周庆元

* * *

浙江大学出版社出版
浙江良渚印刷厂印刷
浙江省新华书店发行

* * *

850×1168 32开本 印张11.25 275千字
1989年8月第1版 1990年6月第2次印刷
印数：3001—7000

ISBN 7-308-00259-4/I·023 定价：4.20元

目 录

绪论	(1)
----	-------

第一章 诗歌	(19)
--------	--------

第一节 概述	(19)
--------	--------

第二节 艾青的诗歌	(27)
-----------	--------

第三节 闻捷、李季的诗歌	(39)
--------------	--------

第四节 郭小川、贺敬之的诗歌	(45)
----------------	--------

第五节 李瑛、柯岩、雷抒雁的诗歌	(58)
------------------	--------

第六节 公刘、邵燕祥、流沙河的诗歌	(65)
-------------------	--------

第七节 舒婷、顾城的诗歌	(73)
--------------	--------

第二章 散文	(83)
--------	--------

第一节 概述	(83)
--------	--------

第二节 巴金的散文	(90)
-----------	--------

第三节 杨朔、秦牧、刘白羽的散文	(97)
------------------	--------

第四节 邓拓、吴晗的杂文	(107)
--------------	---------

第五节 魏巍、徐迟等的报告文学	(112)
-----------------	---------

第三章 戏剧	(122)
--------	---------

第一节 概述	(122)
--------	---------

第二节 老舍的剧作	(133)
-----------	---------

第三节	郭沫若、田汉、曹禺的剧作……………(142)
第四节	《考验》、《报春花》、《血，总是热的》……………(156)
第五节	《妇女代表》、《枯木逢春》、《吉庆有余》……………(169)
第六节	《万水千山》、《霓虹灯下的哨兵》、《火热的心》……………(179)
第七节	《曙光》、《丹心谱》、《陈毅市长》……………(191)
第八节	《屋外有热流》、《野人》、《一个死者对生者的访问》……………(201)

第四章 小说……………(211)

第一节	概述……………(211)
第二节	孙犁、茹志鹃、峻青、王愿坚的短篇小说创作……………(228)
第三节	赵树理、周立波、李准、王汶石的短篇小说创作……………(242)
第四节	王蒙、宗璞、邓友梅、陆文夫的短篇小说创作……………(253)
第五节	《红旗谱》、《保卫延安》、《红日》等革命历史题材的长篇小说……………(260)
第六节	《创业史》及农村题材的长篇小说……………(269)
第七节	《青春之歌》及知识分子题材的长篇小说……………(274)
第八节	刘心武、从维熙等的“伤痕小说”……………(277)
第九节	王蒙等的“反思小说”……………(287)
第十节	蒋子龙等的“改革小说”……………(298)

第十一节	巍巍、徐怀中、李存葆等的军事 小说.....	(312)
第十二节	刘绍棠、邓友梅、陆文夫等的乡土、 市井、风俗画小说.....	(322)
第十三节	姚雪垠等的历史小说.....	(333)
第十四节	探索性小说.....	(339)

绪 论

文学是和人民共命运的。迄今为止的中国当代文学与当代中国人民共同经历了三个政治界限分明的阶段，即以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诞生为标志的，前进中的十七年；“文化大革命”的灾难性的十年；具有伟大历史转折意义的新时期。就当代文学的发展轨迹来看，可恰当地分为四个时期，即1949年到1956年的初创期，1957年到1965年的曲折前进期，1966年到1976年的窒息期，1976年至今的新生期。这样的划分可勾画出当代文学起伏延伸的曲线和总体面貌。

初创期的特点是朝气蓬勃，乐观自信。人民大革命胜利激发的自豪与热情，鼓荡着诗人和作家的血液，使他们笔下闪射着英雄主义和理想主义的灿烂光辉。文学工作者投身于火热的生活，创作紧贴现实斗争的脉搏，是这一时期文学的显著特征。

1949年7月召开的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是当代文学的开端，解放区和国统区的两支文艺队伍的大会师揭开了新中国文艺运动的序幕。周恩来在向大会作的《政治报告》中深刻而完整地阐述了文艺的工农兵方向问题。报告指出：“我们主张文艺为工农兵服务，当然不是说文艺作品只能写工农兵。比方写工人在解放以前的情况，就要写到官僚资本家的压迫；写现在的生产，就要写到劳资两利；写封建农村的农民，就要写到地主的残暴；写人民解放战争，就要写到国民党军队里的那些无谓牺牲的士兵和那些反动军官。所以我不是说我们不要熟悉社会上别的阶级，不要写别的阶级的人物，但是主要的力量应该放在哪里，必

须弄清楚，不然就不可能反映出这个伟大的时代，不可能反映出创造这个伟大时代的伟大的劳动人民”。大会最后作出“决议”，把毛泽东提出的文艺为人民服务并首先为工农兵服务的方向，作为发展新中国的人民文艺的基本方针。会后，文艺为工农兵服务的方向得到了贯彻与实现，一大批为人民服务、为群众喜闻乐见的新作涌现出来。如小说《新事新办》（谷峪）、《结婚》（马烽）、《登记》（赵树理）、《三千里江山》（杨朔）、《活人塘》（陈登科）；通讯特写《生活在英雄们中间》（巴金）、《朝鲜在战火中前进》（刘白羽）、《谁是最可爱的人》（魏巍）；话剧《红旗歌》（鲁煤等集体创作）、《龙须沟》（老舍），引起了广泛的注意。这些作品都是作家的感情和人民生活融合的结晶。

1953年9月召开的第二次全国文代会把繁荣文艺创作列为中心议题。会议实事求是地总结了四年来的文艺创作和批评，对公式化、概念化的错误倾向，即违背艺术规律的文学教条主义和艺术教条主义进行了严肃认真、旗帜鲜明的批评和初步的清理，讨论了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创作原则问题。这对促进文学发展起了一定的积极作用。小说《保卫延安》（杜鹏程）、《风云初记》（孙犁）、《铁道游击队》（知侠）、《三里湾》（赵树理）、《黎明的河边》（峻青）等；诗歌《玉门诗抄》（李季）、《吐鲁番情歌》（闻捷）等；话剧《妇女代表》（孙犁）、《刘莲英》（崔德志）等，酿造了建国以来第一个丰收。

1956年5月，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上提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作为促进艺术发展和科学进步，促进我国社会主义文化繁荣的长期的基本方针。当时的中共中央宣传部长陆定一作了题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讲话，指出：“我们所主张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是提倡在文学艺术工作和科学研究工作中有独立思考的自由，有辩论的自由，有创作和批评的自由，有

发表自己意见的自由。”文学创作的“题材问题，党从未加以限制。只许写工农兵题材，只许写新社会，只许写新人物等等，这种限制是不对的。”^①双百方针给文学工作以有力的推动，造成了春色满园的生机勃勃的景象。文学创作的题材扩大，主题深化，对现实生活中隐藏的消极现象进行尖锐的揭露，并表现了年青一代的蓬勃朝气，如王蒙的小说《组织部新来的年青人》。被偏见禁锢的爱情领域打开了，展示了人物丰富多采的感情世界。如小说《红豆》（宗璞）、《小巷深处》（陆文夫）、《在悬崖上》（邓友梅）等。文艺理论批评也空前活跃，出现了一批颇有创见的文章。如《现实主义——广阔的道路》（秦兆阳）、《论社会主义时代的现实主义》（周勃）、《论“文学是人学”》（钱谷融）、《论人情》（巴人）、《电影的锣鼓》（钟惦斐）等。文学创作繁荣，理论批评活跃，1956年是百花烂漫的中国文艺的春天。

初创期是充满活力的，但也存在着幼稚与浅露。文学作品反映生活缺乏深度，满足于对光明的讴歌，而对现实生活中的新问题、新矛盾揭示得不够，显得表面化与理想化；再是表现方法单一，缺乏多样化，不够丰富多采，公式化、概念化的倾向虽经批评而未能得到纠正，更为严重的是文艺批评上的问题，值得认真地反思。

建国初期重大的文艺思想斗争有三次，即1951年对电影《武训传》的批判运动、1954年对《红楼梦》研究中资产阶级唯心论的批判运动、1955年对胡风文艺思想的批判运动。还有一些规模较小的，如对肖也牧的小说《我们夫妇之间》的批判、对朱定的小说《关连长》以及改编成的同名电影的批判、对长篇小说《战斗到明天》、《我们的力量是无敌的》批判。这大大小小的无

^①《中国当代文学思潮史》，人民文学出版社1987年版，第240页。

数次批判，总的看来是消极作用大于积极作用。在指导思想上是“兴无灭资”，不断加强文化战线上的阶级斗争，把反对资产阶级思想作为意识形态领域中主要的，甚至唯一的斗争目标。想用阶级斗争的杠杆推进新中国的文化建设，用无产阶级思想占领文艺阵地。在一个刚刚取得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的，有着两千多年封建统治与半封建半殖民地历史的国家，这样的要求是否过急过高呢？事实上，新中国急需的是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曾经经历过的思想启蒙运动，当然这应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以无产阶级思想为核心的思想启蒙运动。过急过高的要求只能导致“左”的倾向的产生。如今回顾过去，那几年中的大大小小的批判，“左”的思想居于主导地位。从采用的方式来看，是以群众性的政治批判代替了文艺思想与学术思想的批评，用简单粗暴的过火斗争来代替深入细致的思想辨析。这样的方式无助于文艺思想和学术思想的互相探讨与澄清是非，只能掩盖真理而不能明辨真理，得到的不是合理的结论，而是简单的政治判决。其严重后果之一是伤害了同志。老作家康濯在1979年5月为《肖也牧作品选》写的序文中说，“当时有的文章不实求是地一顿批判，不顾总的倾向而全部予以否定，甚至还波及作者其它作品，却是不容许发表各种意见的自由讨论，和对作品的一分为二。因而那一批评虽没引起对作者的组织处理，但实际也是打棍子，显然影响了作者的名誉”。如果说前几次批判运动对人的组织处理尚持谨慎态度的话，那末对待胡风等人就不是这样了，被定为胡风反革命集团的分子都是作为阶级敌人处理的，蒙冤达20余年之久。这是沉痛的教训。

以上这些批判运动涉及的还只是少数人，因此还没有给整个文艺运动带来巨大的震荡。但连续不断的批判，导致文艺工作急速地向“左”倾斜。

曲折前进期的特点是运动频繁，干扰很大，文学事业在艰难

中曲折前进。

国际形势风云变幻，“匈牙利事件”震惊世人。国外事态影响人们对国内形势的看法。由于对敌情估计过重，又习惯于急风暴雨的斗争方式，在1957年下半年开展了全国性的反右派斗争。当时文艺界反右斗争扩大化是十分严重和突出的，被错划为“右派”的有著名的作家、诗人、文艺理论家，还有一大批刚在创作上崭露头角的年青人。直接受到打击的同志被剥夺了创作的权利，而其他的同志也在思想上受到禁锢，在反映现实方面被束缚了手足，即使是现实主义的匠师也不免于此。孙犁在《谈赵树理》一文中指出，赵树理的作品在1956年后“迟缓了，拘束了，严密了，慎重了，”，“失去了当年的青年泼辣的力量”。^①从此虚浮夸饰之风在文坛盛行，为害无穷。

1958年春，在毛泽东的倡导下，开展了全国规模的声势浩大的收集民歌运动。这是大跃进运动的一个重要部分，各地纷纷提高指标，摆擂台，放卫星。河北束鹿县提出“千人写，万人唱，家家诗歌户户画”的口号。甘肃规划半年产生500名作家、一年产生2000名作家、三年产生10000名作家。这样用搞政治运动的方式来干预文艺创作，完全违背了艺术生产的规律，因而轰轰烈烈的新民歌运动，实际上带来的不是丰收，而是十分微薄的收成。

1960年7月，在北京召开第三次全国文代会。这次大会是在“大跃进”的“左”的错误未能得到克服，国民经济面临严重困难的形势下进行的。会议对于团结全国文艺工作者，帮助他们振奋精神，用自己的作品鼓舞全国人民战胜困难，起了积极的动员作用。但出于对文艺领域中阶级斗争状况的不恰当的估计，大会继续了1957年以后文艺界存在的阶级斗争扩大化的错误，依然强调意识形态领域的阶级斗争，把与资产阶级思想作斗争和反对修正

^① 孙犁：《谈赵树理》，《天津日报》1979年1月4日。

主义作为文艺的首要任务，实际上是唯一的任务。指导思想上的“左”的倾向，使这次大会在发展社会主义文艺方面未能起到应有的作用。

1960年冬，中共中央开始纠正农村工作中的“左”的错误。对国民经济实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文艺政策也随之调整，这给文艺事业带来了转机。周恩来十分关心文艺界的调整工作。1961年6月，他在文艺工作座谈会和故事片创作会议上发表了重要讲话。讲话突出地谈到了艺术民主问题。他说：“现在有一种不好的风气，就是民主作风不够。”“我们要造成民主风气，要改变文艺界的作风，首先要改变干部作风；改变干部作风，首先要改变领导干部的作风”，“民主作风必须从我们这些人做起，要允许批评，允许发表不同的意见。”并严肃指出，那种套框子、抓辫子、挖根子、戴帽子、打棍子的“五子登科”的做法必须改变。^①周恩来的讲话深刻总结了我党领导社会主义文艺的经验与教训，提倡艺术民主，尊重艺术规律，这对发展文艺工作具有重大的指导意义。1962年3月2日，周恩来于文化部、中国剧协在广州召开的话剧、歌剧、儿童剧创作座谈会上，作了《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报告》，陈毅也在3月6日作了报告。他们在报告中，对知识分子在党领导下取得的进步和作出的贡献给予很高的评价。陈毅指出，现在的知识分子“是为无产阶级服务的脑力劳动者”，他代表党和政府郑重宣布给知识分子摘掉资产阶级的帽子。^②周恩来和陈毅以无产阶级的远见和胆识，在文艺调整工作中坚决贯彻和执行党的文艺政策和知识分子政策，极大地调动了广大文艺工作者的积极性，文学园地又充满蓬勃生机。散文、诗歌的名篇佳作，话剧的历史长卷，小说的扛鼎力作，在

①《周恩来论文艺》，人民文学出版社1979年版。

②《中国当代文学思潮史》，人民文学出版社1987年版，第370页。

这一时期纷纷呈现，尤其长篇小说的创作，几乎达到了巅峰状态。在艺术上，脱去了初创期的粗糙与浅露，而趋于精细和丰美，风格沉郁、凝重、宏富，有的作品具有史诗的品格与力度。但从题材来看，写革命历史斗争的远远超过反映现实生活的，缺少直面人生、触及时弊的震聋发聩之作，也减弱了初创期的作品所具有的扑面而来的火热气息与新鲜泼辣的风味。至于大跃进之风所造就的大量平庸低劣的伪饰之作，显然受了当时政治气候的直接影响。

文艺调整工作的成绩是突出的、巨大的，但这一工作因受到干预而中断。1963年12月12日，毛泽东批示：“各种艺术形式——戏剧、曲艺、音乐、美术、舞蹈、电影、诗和文学等等，问题不少，人数很多，社会主义改造在许多部门中，至今收效甚微。许多部门至今还是‘死人’统治着”，“许多共产党人热心提倡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的艺术，却不热心提倡社会主义的艺术，岂非咄咄怪事。”1964年6月27日，再次批示：“这些协会和他们所掌握的刊物的大多数（据说有少数几个好的），十五年来，基本上（不是一切人）不执行政策，做官当老爷，不去接近工农兵，不去反映社会主义的革命和建设。最近几年，竟然跌到了修正主义的边缘。”这两个批示不仅否定了近年的文艺调整工作，也全盘否定建国以来党领导下全体文艺工作者辛勤努力作出的全部成绩。它进一步助长了“左”的思潮在文艺界的扩展、蔓延。于是，批判之火又重新点燃，其势更为猛烈。《人民日报》、《文艺报》等点名批判一系列有影响的作品和理论文章，其中包括影片《北国江南》、《早春二月》、《林家铺子》、《不夜城》；戏曲《李慧娘》、《谢瑶环》、《海瑞罢官》；历史小说《陶渊明写〈挽歌〉》、《杜子美还家》；理论文章《电影创新问题的独白》等，均被强加上“反党反社会主义大毒草”的罪名。从1963年到1965年的持续不断的批判运动，被统称为反对修正主

义的斗争。

文艺工作上的左倾错误是与毛泽东对社会主义时期阶级斗争估计的偏差分不开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指出：“在1962年9月的八届十中全会上，毛泽东把社会主义社会中一定范围内存在的阶级斗争扩大化和绝对化，发展了他在1957年反右派斗争以后提出的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矛盾仍然是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的观点，进一步断言在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资产阶级都将存在和企图复辟，并成为党内产生修正主义的根源。”“在意识形态领域，也对一些文艺作品、学术观点和文艺界学术界的一些代表人物进行了错误的过火的政治批判，在对待知识分子问题、教育科学文化问题上发生了愈来愈严重的‘左’的偏差，并且在后来发展成为‘文化大革命’的导火线。不过，这些错误当时还没有达到支配全局的程度。”但连续不断的剧烈震荡，已经向人们发出了震前预报，一场摧毁性的大地震——“文化大革命”即将来临。

从1957年到1965年九年中，文艺运动的发展扭曲成为“之”字形，前三年与后三年是挫折与倒退，中间三年有所前进，这种进进退退、反反复复的状态表明党的文艺政策存在矛盾，摇摆不定。

窒息期是“文化大革命”这场空前的劫难所造成的，呈现了万马齐喑、百花凋零的可悲情景。

1965年底，毛泽东错误地支持了对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的批判，他在同陈伯达等的谈话中说：“《海瑞罢官》的要害问题是‘罢官’。嘉靖皇帝罢了海瑞的官，1959年我们罢了彭德怀的官，彭德怀也是‘海瑞’。”江青一伙利用这一谈话，把对《海瑞罢官》的批判变成祸及全党全国全民族的“文化大革命”的黑色信号。1966年春，江青与林彪相勾结，泡制了《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抛出“文艺黑线专政论”。这是

为扫荡党的文艺队伍所制造的舆论。《纪要》蛊惑人心地说：

“文艺界在建国后的十五年来，被一条与毛主席思想相对立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线专了我们的政，这条黑线就是资产阶级的文艺思想、现代修正主义的文艺思想和所谓三十年代文艺的结合。‘写真实’论、‘现实主义广阔道路’论、‘现实主义的深化’论、反‘题材决定’论、‘中间人物’论、反‘火药味’论、‘时代精神汇合’论，等等，就是他们的代表性论点，而这些论点，大抵都是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早已批判过的。电影界还有人提出所谓‘离经叛道’论，就是离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之经，叛人民革命战争之道。”对从30年代到建国后15年的文艺运动，《纪要》统统诬蔑为黑线。于是，对所谓黑线人物布下罗网，大施挞伐，使大批作家艺术家受到了批斗、劳改、监禁。全国第四次文代会上宣读的《为被林彪、“四人帮”迫害逝世和身后遭受诬陷的作家、艺术家们致哀》，列举的已故文艺家就有近200人，他们仅仅还是一小部分知名人士。

在攻击进步的文艺运动的同时，江青一伙还千方百计地吹捧自己。张春桥说：“从《国际歌》到革命样板戏，这中间一百多年是一个空白。”“江青同志亲自培育的革命样板戏，开创了无产阶级文艺的新纪元”。那末，“四人帮”的文艺思想是些什么货色呢？“三突出”算是他们的创造。这是于会泳、姚文元等从所谓革命样板戏经验中概括出来，提高而成的“文艺宪法”。即“在所有人物中突出正面人物；在正面人物中突出英雄人物；在英雄人物中突出中心人物”。^①这样一而再、再而三地“突出”的结果，是使英雄人物成为至高无上的主宰，而群众则成为做垫脚石的愚民，这是十足的唯心主义英雄史观。在创作方法上，把丰富多采、千姿百态的现实生

^①《努力塑造无产阶级英雄人物的光辉形象》，《红旗》1969年第11期。

活压缩成为一个框框、一个公式，这是僵死的艺术教条主义。从创作实践来看，他们在影片《欢腾的小凉河》、《决裂》、《春苗》、《反击》中再三“突出”的是誓与“走资派”血战到底的帮派人物，是完全为其篡党夺权的政治阴谋服务的。

在“四人帮”的封建法西斯主义专政的高压下，文苑寂寞，诗坛冷落，寒凝大地，霜锁长夜。但不屈的歌者依然在吟唱。郭小川在1975年写下埋在心中的诗篇。他昂然地说：“战士自有战士的性格：不怕污蔑，不怕恫吓；一切无情的打击，只会使人腰杆挺直，青春焕发”。“战士自有战士的胆识：不信流言，不受欺诈；一切无稽的罪名，只会使人神志清醒，大脑发达”。^①

反抗的种子在仇恨中出土，愤怒的火山在沉默中爆发。1976年4月5日丙辰清明，首都百万群众自发聚会，在天安门广场哀悼敬爱的周总理，抗议万恶的“四人帮”。“四人帮”残酷镇压，充满义愤的群众以白花、诗歌和血肉之躯与之搏斗。天安门诗歌表达了人民群众对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为人民操劳一生的周总理的无限深情。“人民的总理人民爱，人民的总理爱人民。总理和人民同甘苦，人民和总理心连心。”天安门诗歌又是烧向“四人邦”的熊熊烈火。“黄浦江上有座桥，江桥腐朽已动摇。江桥摇，眼看要垮掉；请指示，是拆还是烧？”江青、张春桥、姚文元一伙已是千夫所指，末日将临了。正如诗人艾青所说：“‘天安门事件’像乌云深处的闪电，照出了鬼魅的原形，画出了刽子手的嘴脸；‘天安门事件’敲响了‘四人帮’的丧钟，加速了‘四人帮’的灭亡——把人民的眼睛擦亮”^②。天安门诗歌运动再一次响亮地宣告：中国的当代文学是与当代的中国人民共命运的，诗歌为人民呐喊，人民以诗歌战斗。

①郭小川：《团泊洼的秋天》，《郭小川诗选》，人民文学出版社1979年版。

②艾青：《在浪尖上》，《艾青诗选》，人民文学出版社1979年版。

1976年10月，“四人帮”的垮台意味着文艺的解放，一个新阶段的开始。这一阶段绝非只是因“文革”而中断的前17年文学的简单重复或延续。时代的开放，思想的解放，赋予这一时期以全新的意义。自建国以来，除一度受到苏联文学的影响外，我国文学界与世界文坛，特别是欧美文学界，几乎完全处于隔绝的状态。封闭造成了停滞与凝固。一旦开放，中外文化的接触、交流、撞击，给新时期文学带来极大的活力，震动之大，速度之快，变化之烈，是令人咋舌的。文学运动的这种规模、声势不仅是解放以后，也是“五四”以来少有的，造就了远胜于17年的繁荣兴旺的局面。当然这样的局面不是一下子就到来的。

在1979年10月全国第四次文代会召开前是拨乱反正的阶段，重点是着力批判《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抛出的“文艺黑线专政”论，以及为被《纪要》定为“黑八论”的理论观点辩诬正名。由于《纪要》的出笼是与毛泽东晚年的错误联系在一起的，因此批判中受“两个凡是”的阻碍很大，步履迟疑，顾虑重重，经过实践是检验真理标准的讨论后，才终于突破禁区，彻底推倒“文艺黑线专政”论，完全纠正了把一批文艺工作者看作“黑线头目”，把一些重要文艺会议以及提出的主张看作“黑会”、“黑论”，把一大批文艺作品看作“黑书”的颠倒黑白的状况，文艺界落实政策的工作才得以进行。

从此以后，“四人帮”的阴谋文艺、粉饰与歪曲现实的瞒和骗的文艺受到批判和唾弃。与此同时，革命现实主义的传统得到恢复。真实地反映“文革”悲剧的伤痕文学，表现“文革”前左倾错误的反思文学，冲破了社会主义无悲剧论^①，歌颂与暴露问题上的机械论，突破了题材禁区，显示了作家们正视现实、直面人生的勇气与胆识，扭转了长期充斥文坛的假、大、空的浮夸作风和反现实主义倾向。巴金在1978年12月开始写作《随想录》时写

道：“我不想多说空话，多说大话。我愿意一点一滴做点实在事情，留点痕迹”。“但它们却不是四平八稳，无病呻吟，不痛不痒，人云亦云，说了等于不说，写了等于不写的文章”。①艾青呼叫：“诗人必须说真话”。“人人喜欢听真话。诗人只能以他的由衷之言去摇撼人们的心。诗人也只有和人民在一起，喜怒哀乐都和人民相一致，智慧和勇气都来自人民，才能取得人民的信任”。②以造谣惑众为能事，以瞒和骗欺世盗名的“四人帮”被粉碎后，一个说真话的时代终于到来。

1979年10月，新中国文艺发展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第四次全国文代会在北京召开。这是在历经30年的斗争风雨以后，再一次显示新中国文艺工作者团结奋起的信心与力量的庄严集会。出席会议的3000多名代表中，有“五四”时期投身新文化运动的成就卓著的文坛老将；有“五四”以后，在我国革命的不同阶段，为人民解放事业作出重要贡献的文艺家；有与新中国一同成长并经受锻炼的年富力强的文艺家；有在同林彪、“四人帮”斗争中涌现出来的朝气蓬勃的艺苑新秀；还有台湾、港澳同胞中的文艺家。与会代表“五世同堂”，盛况空前。如果说，第一次文代会标志着新中国文艺的伟大开端，那么，第四次全国文代会则显示着中国人民文艺运动的伟大转折。这次会议是共同总结30年来文艺工作的基本经验，发扬成绩，克服缺点，继往开来，振兴文艺的大会。

邓小平同志代表党中央向大会致的《祝词》，是一个纲领性的文件。《祝词》对建国30年来文艺工作和经历严峻考验的文艺队伍充分予以肯定和赞扬。指出“文革”前的17年，“文艺工作的成绩是显著的。”“在我们党和人民战胜林彪、‘四人帮’的斗争中，文艺工作者做出了令人钦佩的、不可磨灭的贡献”。近

①巴金《随想录·总序》（五卷合订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1987年版。

②艾青《在汽笛的长鸣声中》，《读书》1979年第1期。